

到泊里赶大集

袁勇

每一个经历过山东农村生活的人，心中或许都存有一份关于赶集的鲜活记忆。我也不例外。1988年，我出生在青岛西部的一个村庄，在物质生活并不富裕的童年时期，农村大集承载并满足了我对生活的许多期待。

最近，借着回老家的机会，我又去赶了一次大集，勾起了过往的回忆，也感受到了大集在新时代的生命力。

年少时，总盼着赶集。每到这天，天还未亮透，便会被客户唤起。听到要去赶集，睡眼惺忪很快被兴奋所代替。沿着乡间小路迈向大集，空气中都弥漫着欢乐的气息。

离大集越近，鼎沸的人声越清晰。穿梭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耳畔满是嘈杂的叫卖声。即便是最喜欢清静的人，恐怕也很难排斥这充满烟火气的热闹喧嚣。

相比城市的商超，农村大集的布局杂乱，但却充满一种原始生命力。农副产品散发着泥土的芬芳，翠绿的黄瓜带着清晨的露珠，锃亮的西红柿透着红艳的光泽。卖菜的老农们形态不一，憨厚的笑容，夸张的表情，扯着嗓子叫卖之余与摊前顾客讨价还价。

对山东农民来说，赶大集是一种充满仪式感的生活。无论是生活需要的米面粮油、鱼肉果蔬，还是生产需要的农具、种子，农民们都习惯在大集上认真挑选、采购。因此，赶集的成果事关生活和生产的质量，马虎不得！

在山东，很难找到一个没有大集的乡镇，而且大多数乡镇都有好几个大集。一个乡镇大集的时间，影响着当地农民的“时间表”，人们甚至会按此安排生产生活。大集一般以五天为一个周期，一个大集的赶集日期往往为农历逢一逢六，或逢二逢七，抑或是逢三逢八、逢四逢九，根据集市的规模又可以分为大集和小集。

每到赶集日，邻里乡亲三五成群，结伴赶集，一路欢歌笑语。空身而去，抖掉干农活的疲惫；满载而归，充满对未来的期待。

二

泊里大集在青岛西海岸新区的西南一隅，农历逢四逢九开集。在这里，赶集人的休闲心态集中体现在“吃”上。

很多人来到泊里大集，并不急于采购，而是先找个小吃摊坐下。酒足饭饱之后，再去各个摊位搜寻自己想要的商品。

海鲜，无疑是食客们在泊里大集的最爱。中国约有1.8万公里海岸线，数量庞大的食材贮藏其中。泊里镇南望黄海，北靠藏马山，依山傍海，渔获颇丰，附近海域的对虾、牡蛎、螃蟹、海螺、章鱼等海鲜品质上乘。

泊里大集如同一条纽带，把食客们与这些大自然的馈赠紧密联系在一起。每逢大集日，渔民们就会带着刚刚捕捞的新鲜海货到大集。带着大海味道的鱼市，比其他区域更加拥挤、嘈杂，也更加生机勃勃、恣意张扬。

千百年来，大海慷慨地养育着这片土地上的人。在某种程度上，青岛人吃海鲜，不仅是为了满足口腹之欲，也是在回应与大海之间深入骨髓的情感联系。

不知从何时起，泊里大集有了一道鲜美的小吃——海鲜烩饼。食客们先去鱼市，根据自己的喜好买齐各种海鲜，带到小吃摊上交给摊主，付上15元到20元的加工费，就能吃到一碗热乎乎的海鲜烩饼。

聊起海鲜烩饼的做法，36岁的程焕娟脱口而出：“用新鲜的五花肉打底，葱姜爆香，煸出猪油香味后倒入水，然后依次加入各种海鲜，最后再加入烩饼，用胡椒提味后起锅。虽然是‘烩’，但不能把所有海鲜同时倒进锅里，要根据海鲜易熟程度，排个先后顺序。比如，蛤蜊相对易熟，可以晚点入锅，八带鱼比较难熟，要早一些。”

23岁那年，程焕娟从父亲手里接过班，和丈夫开始在泊里大集做海鲜烩饼。每到大集的日子，她凌晨3点就支起摊，做各种准备。天蒙蒙亮，食客们陆续到来，程焕娟开始了一天的忙碌。生活不会辜负人们的勤劳。她做的海鲜烩饼名声越来越响，不少人特意从外地赶来，只为吃这一口美味。

“客人多的时候，我们一天要做近2000份海鲜烩饼，毛利1万多元，家里的日子越来越好。”算起账来，程焕娟的声音爽朗，一天的疲惫也无法掩盖脸上的笑容。

在农村商品供给有限的年代，赶集人要想买到物美价廉、称心如意的东西，时机很重要。一个“赶”字，准确体现了赶集人的心态。

正如明恩溥在其著作《中国乡村生活》中写的那样：“中国人并不介意徒步走上三里或八里甚至十来里去一个市场。”农民在赶集日天不亮就出门，走上小半天到大集，再平常不过了。

如今，交通越发便利，物资供应来源逐渐多元，农民收入和生活水平不断提升，“赶”的必要性也不复存在了。如今，越来越多的赶集人多了一份休闲的心态。

三

山东大集以历史悠久著称。泊里镇祥和、泊里管区主任周衍默道出泊里大集的历史：“泊里大集最早可以追溯到300多年前。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几乎毁于战乱。新中国成立以后，这里重新‘活’了起来。随着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农村商业逐渐繁荣，泊里大集的规模不断扩大。经过多次

搬迁，从过去的沿路而市，变成今天拥有160亩专属区域的大集。”

展现古老传统文化的本地手工艺品，是泊里大集历史的见证者。其中，以泊里红席最为知名。

关于红席起源时间有多种说法，但可以肯定的是，它经历了漫长的发展与传承。泊里镇编席从业人员众多，泊里大集则是著名的红席集散中心。

青岛农村的席子消费颇有刚性。每到过年，给家里的炕上铺上新席子，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当地有句谚语：炕上没有席，脸上没有皮。

精美的工艺，让泊里红席在当地极受欢迎。红席是用高粱秸劈成篾子交叉编织而成的，具有各种不同花纹的图案，光滑柔软，美观轻便。从种高粱到完成编织，总共20多道工序都要手工完成。

如此繁琐的工序，杨占霞却“闭着眼都知道怎么干”。从小耳濡目染，她跟着父母编红席；结婚后，她又跟丈夫和婆婆一起编红席。

杨占霞说，泊里红席和泊里大集养育了她和许多邻里乡亲。“过去在我们村，几乎家家都编红席，带到泊里大集上去卖。特别是到年集，卖席的摊位一眼望不到头，买席的人更是络绎不绝。靠着在大集上卖红席，乡亲们过了又一个‘年关’。”

城镇化进程中，越来越多村民住进了楼房，家家户户做红席的景象也不复存在。杨占霞的红席销售也从大集转到了线上，从自己编了卖变成客户定制款式。

泊里大集与红席没有失去联系。为了让红席等传统文化传承赓续、发扬光大，当地政府在泊里大集设置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区，邀请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现场演示编织红席等工艺。不少游客到此驻足观赏，拍下视频，发到网上。

四

熟悉泊里大集的人都能清晰地感受到，大集正在向前跑。

2018年，青岛地铁13号线开到泊里。从此，来这里赶集的人不再局限于十里八乡的乡亲，多了许多几十里乃至上百里之外的城里人。如今，每逢赶集日，地铁上满满当当都是赶集人，他们带着对大集的好奇与向往，踏上了这趟充满烟火气的旅程。

短视频的兴起，让泊里大集的知名度扩散到全国。看着无处不在的镜头，摊主们从最开始的无所适从，到如今的侃侃而谈，甚至自己注册账号开启了直播。他们热情地回应着手机里的提问，介绍着大集上的美食和手工艺品，迎来了一波又一波的流量和热度。

巨大的客流和不断提升的知名度，让泊里大集越来越热闹。如今，大集摊位数已经达到3000多个，年交



泊里大集上的手工艺术品——泥质老虎。(视觉中国)

易额达到8亿元。

飙升的数字，考验着当地的管理智慧和能力。管理者们在思考，如何把握住人流和网络热度带来的发展机遇，让3000个和8亿元的数字变得更大；也在思考，如何在保留大集传统味道的同时，让赶集人在这里逛得方便、吃得安心。

于是，大集上垃圾桶的清理频次越来越高，周边道路越来越通畅，排水设施越来越完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大而无序、杂而不乱。远道而来的游客，还可以到大集东侧的暖心小屋休息、充电，寻求路线指引。

每到赶集日，泊里镇党建办副主任陈曦都格外忙碌，他要吧此前确定好的活动项目在大集上落地；与大学合作进行移风易俗宣讲，与医院合作给老百姓进行义诊，与企业合作开展食品安全科普，联合镇司法所开展普法宣传……

在陈曦看来，把安全、便利和法律知识带进穿梭的人流，带给尽可能多的赶集人，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大集的客流量越来越大，对我们是压力，更是机遇。把这些工作做好，泊里大集就会越来越好，当地的发展也会越来越好”。

走出大集，转身回望，喧嚣声依旧。传统与现代在这里交融，回忆与憧憬在这里碰撞。大集独特的生命力，影响着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



当地居民在泊里大集上拉快板。(视觉中国)

秋已深，天渐冷，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杨立超心里却热乎着。不久前，他领到了安置新房的钥匙。说起这套房子，杨立超眼里有光：“这是由我们家过去的‘夹心房’置换来的，自己添点钱还能换个更大的。”

所谓夹心房，是城市规划区范围内已整体拆迁改造中遗留的占地面积小、开发价值低、国有土地上尚未拆除的危旧平房。杨立超的夹心房位于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青山路五号街坊东大型小区的楼栋之间。多年来，没有燃气、排污、取暖等设施，且房屋狭小、跑风漏雨。“卖也卖不掉，住也不好住，夹心房成了一家人的心病。”杨立超说。

同住在东大型小区的姜连芝也有一块心病。家在一楼的她从搬进小区起就得天天面对与周边环境格格不入的夹心房。光线被挡住不说，还经常能闻到呛鼻的味道，家里的窗户总得关得紧紧的。

“周边的住户其实是有想法的。”小区网格员陈玉洁时不时能听到居民的抱怨，“但人家该咋住还得咋住，总不能赶走人家，前些年也有拆迁的说法，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最后不了了之。”

不管是对住户还是邻居来说，夹心房已然成了闹心房。“过去，因房屋权属情况复杂、地块边界不清等原因，未能随着周边区域同步完成改造，夹心房被遗留在各小区建筑群中，居住其中的居民和周边住户迫切希望妥善处置夹心房。”包头市夹心房改造工作组综合组成员马兴盛说。

难题未必无解，去年10月份，事情有了转机。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包头市确定实施夹心房改造项目33个、553户，占地面积约87.71亩，改造面积约3.55万平方米。

“实在想不到，多年来的心病就这么治好了。”杨立超记得，去年11月初，市里召开夹心房改造工程动员部署会后不久，自家的夹心房就被拆除了。“今年3月启动安置房建设，9月30日市里举行夹心房改造安置房集中交付活动，现场交付的安置房均实现‘交房即交证’，我家钥匙就是在那时候领到的，速度真是快。”

说起这些事，杨立超和姜连芝都满心欢喜，马兴盛的脸上也洋溢着自家的笑容。“说干就干，开局即决战。1个多月的时间完成所有相关居民的搬迁和房屋拆除工作。”马兴盛说，夹心房改造是民生工程，由实力强、信誉好的企业承建，在保证工程项目安全质量的前提下加快建设进度，7个月便完成了工程建设。

“要包头速度，更要包头质量。对夹心房拆除后的地块合理规划，优先建设住宅、保障回迁，不能回迁的非安置区域全部进行硬化，增设停车位、充电桩等基础设施。”马兴盛说，“上午还一片狼藉，下午就遍地惊喜，正是居民们的心声。”

钥匙领来了，装修的事得赶紧跟上，这些天杨立超忙前忙后，与家人一起为新居确定装修方案，希望能早日住进宽敞明亮的新房。姜连芝屋里亮堂了，心里也亮堂了。“如今夹心房改造成了停车场，干干净净的，还方便停车。”她笑着说。

余健



山东省青岛市西海岸新区泊里大集。(视觉中国)

此长彼长

赵序茅

2011年，我有幸参与了金雕繁殖生态项目，前往金雕保护区——阿拉套山寻找金雕巢穴。彼时社会对野生动物的保护力度远不如现在，保护区条件差，理念也比较落后：保护区内不允许有人类活动，不允许有经营性收入，全靠政府拨款维持。习惯了“靠山吃山”的当地百姓，在保护区建成后无法从原有资源中获取经济价值，不少人铤而走险进行非法活动。

当时，有一个问题在我心里发芽：物种多样性保护能否实现自然与人类、生态与经济的双赢？

2013年，我第一次接触到了观鸟活动。当时，国内的观鸟活动刚刚兴起。然而在国外，观鸟早已成为一个产业。此后不久，国内各地兴起观鸟热，各类协

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观鸟经济迅速崛起，成为乡村振兴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在云南高黎贡山脚下有个叫百花岭的小村庄，地处偏僻，无人问津，在地图上寻找都很费劲。但因其鸟类资源丰富，百花岭逐渐吸引了很多鸟友，在小圈子内颇有知名度。

如今观鸟已经形成完整的产业链，由小众需求发展为旅游产业生力军。很多地区修建基础设施、划定珍稀保护区、组织研学活动等，为观鸟及相关活动提供便利。在江西婺源，当地短短几年时间接待观鸟研学上百万人次，年接待白腿小隼摄影发烧友达1万多人次。

据统计，我国有1000多个特色观鸟旅游目的地，包含了200多种观赏价值极高

的明星鸟，比如江西婺源的黄喉噪鹛、河南罗山董寨的白冠长尾雉、广西龙州县弄岗村的长尾阔嘴鸟和印支绿鹇等。很多鸟友不远万里而来，只为一睹其芳容。

观鸟活动带动旅游消费的同时，为物种多样性的保护也带来极大利好。每年，很多鸟类新记录都是由观鸟者发现的，甚至不少新物种也是由自然爱好者发现的，比如新疆的白兀鹫。

事实证明，在物种多样性保护与人类合理经济活动之间是能够找到一个契合点，实现此长彼长的。

大熊猫作为国宝，可谓家喻户晓，深受外国游客喜爱。为保护这位动物“大明星”，政府每年在大熊猫身上投入颇多。费力保护大熊猫对当地发展有何好

处？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魏辅文院士和其团队专门算了一笔保护大熊猫的经济账：国家每年对大熊猫的现行保护制度的收益/成本比率为10.2，如果把大熊猫为全球人口创造的文化价值也算上，那么投资回报率可以达到27.1。保护大熊猫产生了巨大的价值回报。

由此可见，一方面，要尽一切可能的努力去保护生物多样性和脆弱的生态系统。另一方面，也要把握好保护和发展的平衡。只有发展，才有可持续的保护。因此，保护政策的实施，要深深嵌入经济需要、民众需求之间。唯有如此，方能达到自然与人类真正持久的和谐统一。